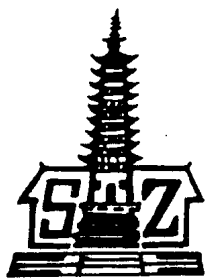


石家莊地方史志研究叢書 之一

大興紗廠史稿

楊俊科 梁 勇 著



中国展望出版社

《石家庄地方史志研究丛书》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 虹	方延青	王国玉	邓绶林	史念海
朱士嘉	来新夏	吴承明	陈桥驿	张恒寿
张志学	张德友	侯仁之	钱君晔	傅振伦
鲁仲文	曹 孜	雷文治	魏连科	

察古知今
以史為鑑



為史志叢書題
高占祥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
為《石家莊地方史志研究叢書》題詞

治史情志
弘毅及人



李建英



「石家庄市志」主编、石家庄市书法协会
名誉主席、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建英题词

研究地方史者繼承卓
越傳統發揚優秀文化
化提高人民素質

陳橋驛書



戊辰歲尾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

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桥驛教授题词

先祀祀方懷歷農工昔自燕
 大原載德慨史戶籍行古名
 榮采明鼎悲人棉紡恒東麓
 援耆遊壯才粮织陽部平
 張恒春題

著名史学家、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张恒春
 为《石家庄地方史志研究丛书》题词

《石家庄地方史志研究丛书》总序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
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梁新夏

史志关系久为史志学界所争论，或主史志各异，或主史志合一，皆各有所偏；平心而论，史志二体，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固无需胶着一端。远溯汉晋以来的《越绝书》、《吴越春秋》、《襄阳耆旧传》、《华阳国志》以及唐代的《蛮书》、《太原事迹》，其内容多兼及人物、地理与都邑，为一方史志之作。洎宋代，地方史志始有区分，地志名称也独具志体特色，如临安三志、《吴郡志》等。但巨作《舆地纪胜》仍义兼史志，著者王胜之序其书说：

“每郡自为一编，以郡之沿革，见之篇首，而诸邑次之，郡之风俗又次之，其它如山川之英华，人物之奇杰，吏治之循良，方言之异闻，故老之传说与夫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皆附见焉。”

这就无怪清乾嘉学者钱大昕赞其书“裨益于史事者不少。”清代于史志二体就有戴震与章学诚之争。直至晚近，争议仍未稍息。其实际编志者则一意成志，无暇与议，以致成著大多重现状而轻历史，颇失史经志纬的立意。现状的纂辑有各专业各局口的分工搜求，有档册文书之可据，自易于成文；而历史的钻研，设非潜心寝馈，益以考辨优选，实难于立论。苟能既有坚实的“史纵”，复具广被的“志横”，二者相辅相成，则地方史志事业行见蒸蒸日上，更登层楼。有识之士固当戮力于此，而比年所见能躬行其事者则惟石家庄市史志研究者杨俊科、梁勇诸君。

石家庄之地自先秦以来即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所贡献；后历经兴革，日趋繁富；近代以来，尤称重镇。河北拱卫首都，石市以后起

城市，代保府而居省会，为萃集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市志编修，待举眉睫；但主政诸公寓目全局，不斤斤于志书编修之迟速，而汲汲于合史志之统筹，杨、梁诸有识之士更能明确认识深辨历史固将有裨于地志的提高，于是有编辑《石家庄地方史志研究丛书》的倡议，并已撰成《大兴纱厂史稿》及《石家庄史志论稿》二书问世。我早知信息而未及时获读，正在求书之际，《石家庄史志论稿》撰者梁勇同志即举所著相赠，并盛情邀我为《石家庄地方史志研究丛书》补写总序。这就迫使我不不得不在公私猬集之余通读《石家庄史志论稿》。

我虽然一直主张开展区域性历史研究，近年来又曾阅读上海、四川、天津等地方史书；但所见各著多偏于综合论述而罕见专题研究之作。及读石市论稿，深佩作者的艰苦攻关。他们力求以正确理论、丰富资料对石市远古以来的各方面历史进行较系统研究，并能于不数年间陆续成书二种以问世，实堪欣慰。至《石家庄地方史志研究丛书》的价值，也可举一以反三。即以《石家庄史志论稿》一书为例，全书共分三编，上编论政区沿革及经济发展史，中编论文化发展的进程，下编则为专题考证，于古史沿革作详尽考议，鞭辟近里，足征功力。《石家庄史志论稿》虽为史作，其于地志之编撰无异使现状展翼于历史础石之上，编撰新志将愈转深沈。职是之故，我不仅乐为之序以弘扬其事，抑望新志编撰者以此为鉴，深化编志工作，提高新志质量，则《石家庄地方史志研究丛书》不止为史志研究开拓视野，也将有裨于新志的传世。杨、梁诸君的宿愿也将以此而得偿。

一九八九年一月于南开大学



本书作者之一杨俊科（右）走访
大兴公司第三任董事长黄师让



大兴公司第二任董事长 苏汰余

三十年代大兴纱厂工读学校



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經濟部 執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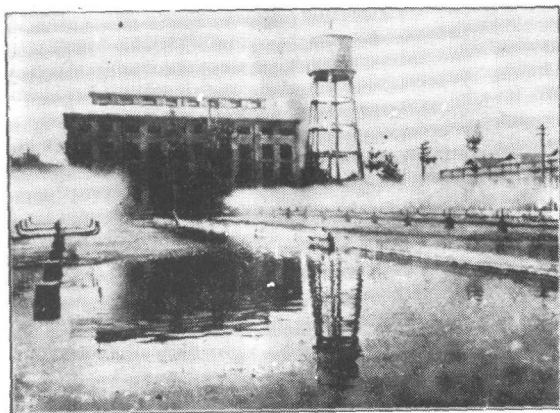
茲因 大兴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資本
呈請變更登記本部查核符合行換發執照以資
憑證

摘錄登記事項如左

公司名稱 大兴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所營業業 紡織業
資本總額 國幣一千萬元
每股金額 國幣一千元
每股已繳金數 國幣五百元
本公司所在地 湖北漢口
登記年月日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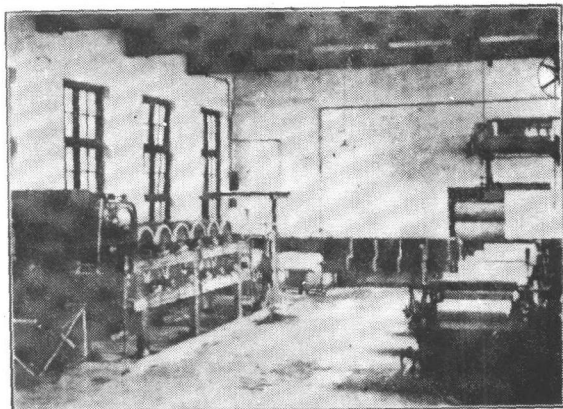
部長 王世杰
商業司長 鄧翰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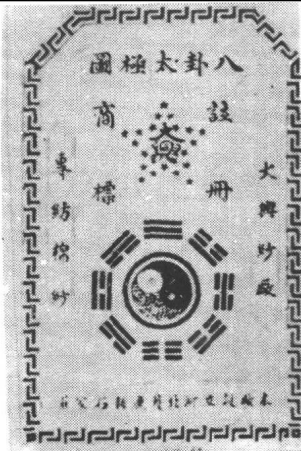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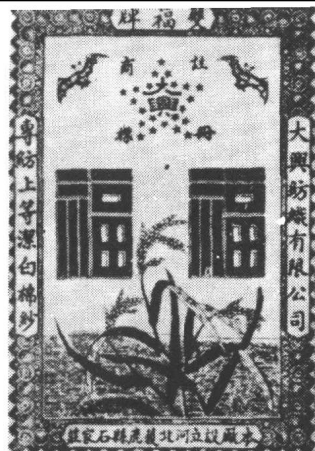
右給 大兴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收執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二號



三十年代大兴创办初期发电场的喷水池

三十年代的大兴漂染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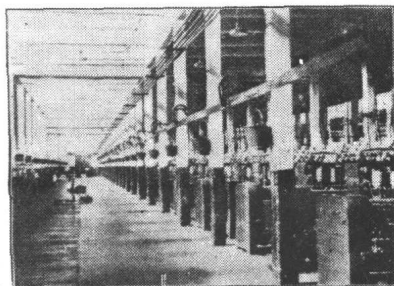


大興紗廠棉紗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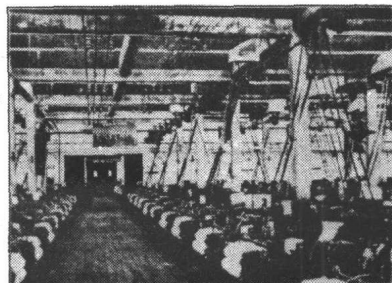
大興紗廠棉布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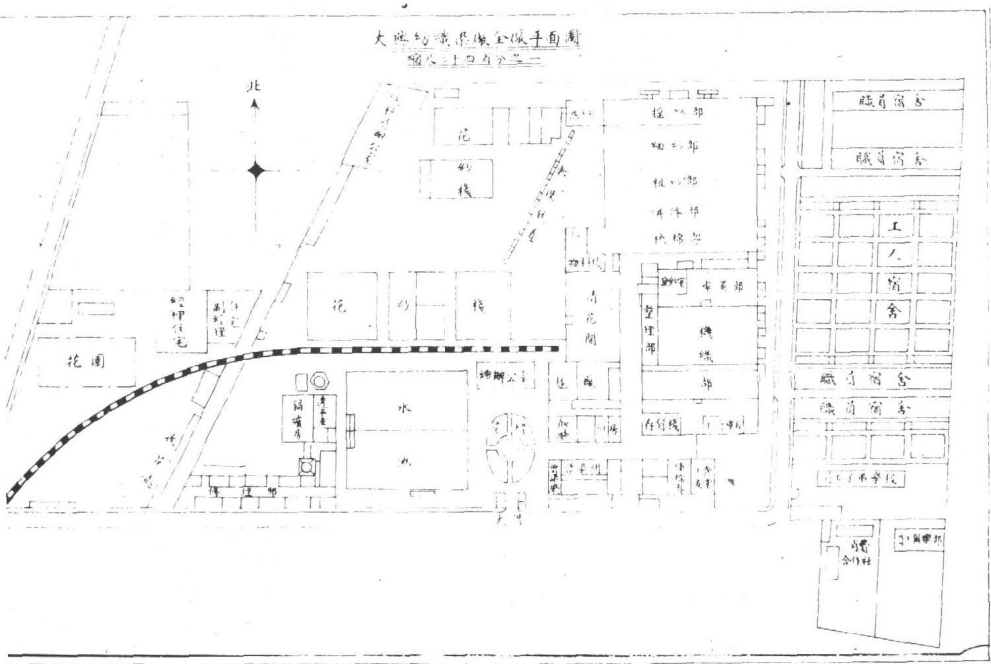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大興紗廠紡紗車間內景



三十年代大興紗廠織布車間內景





三十年代大兴纱厂平面图



1951年大兴
纱厂劳动模
范高明玉(后
右)、张栋
(前左)、
武令姐(前
中)等人赴
天津出席河
北省劳模会
时的合影。

序《大兴纱厂史稿》

兼论企业史和中国近代化道路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吴承明

大兴纱厂是石家庄地区近代工业的先导，也是我国内地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一个典型。杨俊科同志曾任职该厂，多年潜心收集大兴史料，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走访了各地有关当事人，钩沉稽隐，与梁勇同志合撰《大兴纱厂史稿》。我得先睹原稿，不胜快慰。本书是一部企业史，值该书问世之际，我想就企业史与研究中国近代化的问题，略述管见。

企业史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为盛行，差不多每家较大公司都有自己的专史，且不少是请专家撰写。对于企业史的研究，则主要属于经营学学科。大兴纱厂创办三十年间，主事者采取稳健的发展方针，财务上厚积存底，生产上注意产品信誉，以适应农村用户的要求为依归，经营思想具有民族特色。同时也两度派员赴日本考察，吸取先进经验，力求改进。这是大兴经营成功的原因之一，本书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足资今日企业管理借鉴。

然而，企业史在我国经济史的研究中还有它更广泛的意义。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宏观经济资料非常贫乏，加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资本形态及其运动的复杂性，常需借助于各类典型企

业来研究其发展道路。在内部生产关系方面，更需要从微观上考察其特征，即所谓“解剖麻雀”的方法。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或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从考虑方法来说，总的不外两种方式，即系统论方式和因素论方式。前者是从设定一定的经济模式出发，注重于经济结构的演变。后者是从探讨发展中的能动因素入手，最后完成整体架构。就我国现有的历史资料情况和研究成果来看，我历来倾向于采取后一方式。在这种思考方式中，企业有如细胞，企业史具有更重要作用。建国之初，我参加陈翰笙、范文澜同志领导的一个“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该会出版的第一本书，即我所编的开滦煤矿矿权史料。六十年代初，我受命主编一套“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书”，到“文革”前已出八种，第一种也是一本企业史，即北京瑞蚨祥。近年来，陆续有多种企业史出版，并且由资料书进而成为专著，史论并行。《大兴纱厂史稿》当是最新的一部。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这些著作的完成，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不可缺少的贡献。

棉纺织工业是我国比较最有发展的近代工业，到1936年，它已有了替代进口洋纱洋布的生产能力。自十九世纪末我国创办纱厂起，它就是在我国历史上已臻发达的农家手纺织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利用农村丰富的棉产和劳动力，用现代化方法加工成纱，再卖给农村机户织成布；以此积累资本。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再逐步扩充纱厂的机器织布，以机布代替商品土布。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工业化道路。它同当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那种以印度和美洲为原料基地、以殖民地作为销售市场的发展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既然如此，我国的纱厂本应建设在内地城镇，以农村为基地，但事实上，它不仅首先出现于帝国主义控制的条约口岸，并始终集中于沿海地区。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半殖民地性的表现，它扭曲了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发展的道路，也最后扼杀了它的发展。以致我们研究近代工业史，

所见也主要是以口岸为基地、以外国租界为背景的纱厂史料，不能洞悉棉纺织业本来应有的生产和经营的经验。为了研究内地办厂的得失，我们在六十年代初拟订“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书”出版计划时，就布置了南通大生资本集团和武汉裕大华资本集团两个选题。大生资本集团史后来由南通博物馆和张謇研究中心完成，闻已付梓；《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由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几个单位完成，已于1984年出版。

大兴纱厂是裕大华资本集团的企业之一。它位于我国主要棉产区河北省南部，可利用附近的井陉煤发电，又邻近高阳、定县等发达的手织区，有良好的市场条件。《大兴纱厂史稿》详述了它的这些“地利”条件，并从原棉采购、劳动力资源、生产成本、销售方式上作了分析。也研究了内地办厂的种种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军阀混战的破坏、捐税勒索、交通屡断等封建势力的钳制。本来，原楚兴公司是靠租办湖北官布局起家的，1922年因湖北“将军团”夺走布局遂再创办裕华和大兴；“九一八”事变后，大兴陷于危机，因而在西安创办分厂（即后来的大华），“以舒石厂之困”；抗战前夕，大兴一度筹划卖厂，而抗战后不久，即遭日寇劫管。大兴的历史，一如整个民族工业，是一部辛酸史。但裕大华资本集团在此过程中，力排众难，并力求发展，它也确实得到发展，并以余利开发利华、广元煤矿以及运输、植棉、贸易以至银行事业。在这方面，集团主事人的决策和企业家长精神是不容忽视的，而它的内地办厂的工业化路线则更值得我们研究。

大生纱厂的厄运来得更早，1925年即因负债累累被银行因接管。但张謇以大生资本力量而创建的，包括农、工、商、运输以至金融的“南通实业”，则至今仍为南通人士所怀念。我认为，大生、裕大华所走的道路在当时是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它

的特征即在于不仅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而且立足于本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形成工农结合和以农村为基础的格局。它与那种移植西方的、以条约口岸为基地的工业化路线形成强烈的对比。但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这种工业化道路不仅总的说是失败的,而且遭受忽视、默默无闻。一度流行的反而是那种其“现代”和“传统”完全对立起来,视为互斥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这实际是以西欧工业化为模式的理论。在1987年召开的“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曾提出一篇论文,兼讨论了棉纺织以外的一些工业的发展历史,我说:“我国近代化历史上的失败,既有其内部的原因(封建主义),也有外部的原因(帝国主义)。但在失败史中,我们还可隐约地看见一些中国式工业化的努力的踪影,这就是张謇在南通的未完成的事业”。

我的想法很简单,即为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无论过去(当然它只能提供经验和教训)或今天,都不能仅是引进外国先进的东西,而且要立足于本土,充分发掘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走中国式的道路。

我希望《大兴纱厂史稿》的问世,能引起近代经济史学界的兴趣,对中国近代化的道路进行深入的讨论。

1989年9月

序

石家庄市纺织工业公司经理 苏志书

石家庄第七棉纺厂，是一座纺织、染整配套的大型企业；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色织布生产基地。它的前身就是石家庄大兴纱厂，即石家庄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大兴纱厂是1921年由武汉楚兴公司投资210万两白银创建的。1922年10月投产，是石家庄第一家大型纺织工业企业。大兴纱厂的创建，在石家庄乃至河北经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石家庄纺织工业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认真、全面、系统、科学地研究这座纺织企业的发展历史，剖析它与石家庄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不仅是河北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更是石家庄地方史志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杨俊科同志曾在大兴纱厂工作多年，熟谙大兴纱厂的历史。他不顾辛劳，利用工作之余，潜心搜集大兴纱厂史料，多次北上京津，南下川鄂，赴宁沪，奔关中，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并广泛走访大兴纱厂老职员、老工人，收集、整理了百余万字的原始